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人際和諧與忍讓價值觀：從人際衝突因應看代間差異

計畫編號：NSC-90-2413-H-031-006-SSS

執行期間：九十年八月一日至九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計畫主持人：羅國英教授

執行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 一、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目前台灣的青少年世代，在人際和諧與忍讓的價值觀上，和他們的父母是否存有明顯的代間差異，同時探討這些價值觀對於人們評價各種人際衝突情境，會有多大的影響。研究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針對一千多名國中一、二年級的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父親或母親），調查他們對於相關價值觀的重視程度，旨在比較兩代之間的差異。第二階段的研究則針對上述第二個目的，從第一階段的受訪群中徵求自願者參與三次的後續活動，每一次活動都請參與者針對一些人際衝突事例，評判故事主角的行為（包括贊同度及各種正負面語意判斷），並進行親子對談，最後並檢驗這些活動是否有益於促進親子間的相互瞭解或是具有改變價值觀或人際自信的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世代間雖有一些差異，但並不那麼明顯絕對。年輕一代比起他們的父母，的確比較不那麼排斥人際衝突，也比較重視自我伸張的價值觀，但價值觀差異僅指相對重視程度而言（如果用原始分數來看，年長的一代對於各種價值的重視程度都比年輕一代高）。兩代之間對於各種人際衝突的評價也有相當多的差異，但兩代做衝突判斷時的潛在語意向度其實相當的相似，用來區別不同衝突情境的主要向度同樣是「人情考量」和「現實理性」。價值觀和各種人際衝突事例判斷之間都只有零散而微弱的相關。價值觀加上其他相關變數（包括：關於爭執或退讓的信念、對傳統人情運作的接受程度、以及人們對於社會現狀的認知等因素）共同來預測

衝突評價時，預測能力仍然相當有限，而且預測模式並不穩定，很多情況預測力根本不顯著，對於各種不同的人際衝突情境，能具有顯著預測力的變數也並不一致，不過相對而言，價值觀對父母群體似乎具有比較穩定而重要的意義。整體來說，兩代在觀念上確實有一些差異，新世代似乎是不斷但相當緩慢的走向個人主義價值觀，也越來越傾向於主張「人際和諧雖然重要，但未必要用退讓或委曲求全的手段」。

受訪者對於參與第二階段的親子討論活動普遍有正面的回饋，認為這樣的討論對自身有益，也有助於親子的相互了解，其中父母們的反應又比青少年更正面。這一系列活動並沒有造成任何一方價值觀的顯著改變，但對於青少年的人際自信卻有一些影響——部分青少年的人際自信有些微降低的現象。研究者原本猜測青少年在與父母分享討論人際難題之後，可能會因為曾經深入思考因應之道而變得較有自信，但結果卻似乎剛好相反，顯示這樣的活動目前只能做到讓他們察覺做人的難處，卻並未能協助他們找到適當的因應或解決的方法。

關鍵詞：價值觀，人際衝突，和諧信念，青少年，親子對偶

##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its emphasis on interpersonal harmony and tolerance. However, this cultural legacy has been challenged for the recent decades.

Young people tend to be more and more reluctant to yield or to tolerate in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gap between the teenagers and their par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is value orientation plays in people's judgment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as well.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be other facto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addition to the simple reports of value priority. The factors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how the rules of Guanxi and Renqing are accepted by different generations, how do they perceive the social reality, and how do they reorganize the value system about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their social context.

The author made a series of survey-and-interview to about 200 families for several times. Anticipants are invited from a first phase survey as a basis, which included about 1100 families with two members for each family (a adolescent child and one of the parents). A special design for this study is that the anticipants instead of the researcher will do the interviews. The author invited the parent-child dyads to report their opinions about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t first and then discuss with each other on the issues provided in the questionnaires. Besides filling up the questionnaires about their discussion, some of the anticipants were also asked to record their conversations. Similar procedures as above were conducted for three times, with intervals of 3 to 4 months between each.

The results regarding generation gap upon value orienta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at found in previous studies. Yet the differences are not so obvious and absolute as some people may imagine.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change of value orientation among generations is slow, in a sense back and forth, but all the way toward individualism. New generation still emphasize social or interpersonal harmony a

lot, while they are less and less willing to regard self-restrain or self-sacrifice as a virtue of that importance

It is hoped that parent-child dialogues upon the issue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will not only reveal their value systems, but also be beneficial to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lf-identity and to thei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 we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neficial effect is partly evident. Most of the anticipants give positive feedbacks in terms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self-perceived personal growth. Yet to the dismay of the author, part of the adolescents attended in the study get lower scores on self-confidence on social competence after attending these activities.

Key words: value preference; interpersonal conflict; harmony belief; adolescents; family dyads;

## 二、背景目的

在人際互動中，某些事要不要追究，該不該容忍，可不可以抗爭，能不能拒絕，恐怕是所有社會人都要面對的人生功課。研究者認為，對於格外重視「做人」的中國人而言，這種功課的重要性和難度都可能更高，是一個值得密切觀察的文化現象。整體而言，重視和諧、避免衝突及強調忍讓常被認為是華人社會行為的重要特點，這種重視和強調，可能已經超越了使人際互動順暢的、現實工具性的考慮，而成為一種價值觀，甚至於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相較於「汲汲營營」、「斤斤計較」、「得理不饒人」，能優雅地退讓、寬容體諒、豁達大度似乎是傳統中國

人眼中更高貴的人生境界，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人際關係緊密且長久，因而發展出來的文化特徵。

忍讓常是一種意識中的決策，通常不是件快樂和容易做到的事，只不過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中，它漸漸與諸多其他的價值觀(例如天人和諧的理想)整合出一套綿密的人際關係思想，因而也成為一種被賦予了某些超越的、具有道德修養意味的價值觀。但這樣的文化傳統顯然正面臨著重大考驗。父母師長的權威受到質疑和挑戰，個人本位的權利意識不再被無條件壓制，謙讓容忍也不再全面地被視為一種美德。這種趨勢通常被理解為西方個人主義強調平等與人權的價值觀，隨著資本主義的強大侵略性所造成的影響。很多現代人開始視忍讓為一種「手段價值」或「工具價值」，是一種對環境瞭解與適應的「務實」的反應。總之，當大環境轉換，由於基本上忍讓的令人不快樂與不容易做到，加上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目前具有的文化優勢，使得它成為一種容易被拋棄或改變的價值觀。由於忍與不忍是相當截然不同的衝突反應，又是幾乎每天都可能遇到的抉擇，會立即衝擊人際關係，於是它也可能是文化變遷過程中，最容易被感受到的價值變遷。

儘管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似乎已經對很多人產生了影響，現代生活中的年輕人並沒有完全拋棄傳統的價

值觀，有相當多的研究顯示某些傳統的價值觀仍然被新一代的年輕人所重視，而形成一種傳統價值與個人主義價值並存的價值體系，Brindley (1990) 將它稱為一種華人個人主義 (Chinese individualism)。另一方面，由於價值觀的新舊夾陳，同樣的行為可能同時被某些人視為過度懦弱，而被另一些人視為衝動冒犯。於是我們可以想像在人際的爭、讓、進、退之間，不僅具有很複雜的傳統意涵，更有自主、人權、平等等價值觀和強烈的自我意識介入作用，人際互動中發生兩難情境，恐怕更是容易的事。此外，如果容忍作為一種手段價值的話，則對於環境的認識與信念便會是決定人們爭讓決策的重要因素，很多時候人們只是擔憂自己行為引人側目而不敢「造次」。總之人際衝突的因應可能比舊時代具有更多元的意義和選擇，我們不僅要面對內在的價值衝突，還要猜測週遭的人會怎麼看待自己的反應，於是爭讓之間成了更複雜的人生功課。現代的年輕人究竟如何面對這種複雜的人生功課，而不同世代又如何不同地選擇性接受傳統文化呢？

在許多價值觀的研究中，一再地顯示年輕一代逐漸地不再願意忍耐不合理的待遇，不再那麼重視忍讓，而逐漸地強調個人主張和權利，產生出一種「反傳統」的價值(例如黃光國，1993，1995)。但真的是一代比一代更不重視和諧忍讓的傳統

了嗎？的確，生活在許多傳統價值觀依然濃厚的社會中，大家都很容易發現重視和諧退讓的價值觀在實際生活中變質與形式化的後遺症：追求和平和諧經常只是懦弱怕事的託詞；在和諧的大帽子底下，滋生著鄉愿苟且，只問平安不問是非的和稀泥心態；強調謙讓使得人際關係中常有虛偽和不公平的狀況，白白讓不遵守這種規則的投機份子占盡好處；「和稀泥」成為許多組織藏污納垢，效率不彰的病根。所以，許多在這種傳統與西方思潮撞擊中生活的人不想對這種「文化傳統」照單全收，而且對於相對不熟悉的個人主義講究人權、公平和自主的價值觀懷有好感，應該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年輕世代反對傳統固然可能反映時代的變遷，也可能和他們的生活經驗比較單純有關。以目前的中年世代來說，他們也曾經年輕過，也成長於西方思潮和資本主義的文化衝擊之下，恐怕在價值觀上未必比他們的子女更認同這些傳統，但也許在經歷了台灣近幾十年的政治經濟的快速變化和人事歷練，看到許多被媒體快速大量傳播的「社會亂象」，有些人從務實的角度重新思索，或是對於傳統思想有更深刻的體認，對價值思想體系作過重新調整。總之，令研究者好奇的是，世代間的價值觀究竟還有哪些差異，研究者更想知道調查中發現的價值觀差異所代表的真正意義。

想要研究親子價值觀差異的另

一個原因，是研究者從另一個研究中發現青少年對父母的價值觀或是教養上的期望，普遍並不瞭解，而這種不了解很可能是親子關係緊張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許多心理學家認為青少年正處於自我確認以及價值觀確認的發展階段，如果能在這個階段給予適當的刺激和引導，應該有益於他們的人格發展。因此如果經由適當的設計，讓親子有機會針對人際衝突的議題作分享和溝通，或甚至適度的辯論澄清，對於受訪青少年和他們的父母而言，應該是一項有益的親子活動，不僅有益於親子關係的增進，也可能使得青少年深刻思考價值觀的內涵、學習處理人際衝突的技巧。

總之，本研究關心的議題包括價值觀的代間傳遞和變遷，以及價值觀如何影響人們對人際衝突因應方式的評價。另外，本研究也希望能對親子之間的價值傳遞或家庭教化等現象做初步探討。研究者從既有文獻中，發展出下列五項個人觀點作為本研究的基礎，簡述如下（限於篇幅，此處只呈現結論而未說明理由）：

1. 有關和諧與容忍的文化意義：中國人追求和諧由來已久，因而在文化的集體記憶裡，從務實的工具理性到超越的人生觀或宇宙觀，「和諧」其實有不同的價值層次。人們的價值觀會形成叢聚，和和諧密切相關的「容忍」美德或價值，也因此有相對應的分殊意義。

2. 有關價值文化的保存與變遷：傳統的價值既不會從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中全面撤退，大概也不會全盤延續。傳統與現代的價值論述會在實際生活運作的搓揉當中，不斷地尋求平衡。
3. 有關價值觀與實際生活表現的落差：價值觀也許並不那麼全面地、一致地影響生活中的各種行動或判斷。和諧忍讓的價值觀和實際生活表現會有落差，可以從兩方面來預測：一方面中國人重視「人情」或「關係」的既有互動規則深入眾人社會生活的底層，另一方面價值觀的社會認知體系本身就具有內容不完全一致以及處理方式因時地而異的不穩定本質。
4. 有關「關係與人情」與人際衝突因應：忍讓的價值觀是否運用在特定的人際互動情境中，和當事人雙方的人際關係內涵（情感性、工具性及既定關係成分等組成）有關。這種重視人情與關係的特性也許會長期維持，但比較具體的互動規範卻可能已經有相當大的變遷。
5. 有關和諧忍讓價值觀的代間差異：年齡會使許多人行為上趨向傳統和保守，但研究者猜測價值觀上真正較大的改變是「務實」的價值。和諧忍讓等相關信念的代間差距也許並不如年輕世代想像的來得明顯。

### 三、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基本觀點或假設，本研究希望能解答下列問題：

1. 有關人際間的忍讓寬容的價值觀及相關信念，目前的青少年和他們的父母之間，究竟有沒有差異，差異有多大？
2. 上述價值觀對於實際上人際衝突中的判斷或決策，有多大的決定力？
3. 除了價值觀之外，其他相關的信念是否有助於預測人們對於人際衝突因應的判斷？價值觀和這些變數對於人際衝突因應的判斷有沒有特定的預測模式或規則？
4. 親子之間討論及分享對於人際衝突的看法，會不會促使親方或子方調整或改變他們的價值觀？有沒有增進親子了解或是人際自信的功能？

###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多次的調查，對象是兩所國中的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第一階段的調查對象比較廣泛，第二階段則是從第一階段受訪群中徵求自願參與的家庭，接受後續的訪查（每一個家庭兩位受訪者，學生及其家長之一）。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本研究的後續調查中，除了要求受訪者回答一些與人際衝突有關的問題外，也要求青少年和他們的家長（父親或母親）根據問卷內容做一些分享

和討論，接著再進一步回答一些有關討論過程的問題。兩所國中總共約有 1100 名學生及 900 位家長填答了第一階段的調查問卷，其中大約 200 個家庭同意繼續參與後續的訪查。在三次後續訪查中，每一次都有一部份受訪者因故沒有回覆問卷，但回卷率尚佳，大約都在 80% 左右。

#### 主要研究變數及其測量：

1. 價值觀：指對抽象價值陳述的重視程度，操作上是請受訪者評定他們對各種價值陳述的重視程度（0~10 分評定，數字越大代表該項價值越受重視），本研究所測量的內容包括兩個主要向度：對傳統謙讓寬容的價值觀，以及對個人主義強調自我伸張的價值觀。青少年及他們的父母都要各自填寫這個量表，有一部份受訪者且在研究結束時重複測量，以便了解價值觀的穩定性以及討論活動的影響。
2. 人際衝突因應的評價：這個變數的內容包括人們對於多種人際衝突因應方式的贊同程度以及相對應的語意聯想。由研究者經由個別或焦點團體訪談所產生的素材，編寫人際衝突情境，請受訪者判斷故事主角的因應方式是否適當。再用類似語意區辨測量（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scaling）的方式，評定他們對主角行為的各種感受。

3. 人情運作法則的信念：指對傳統中國人的各種人情運作法則的同意程度。研究者從傳統中國人的人情運作規則中歸納出四種成分向度，分別是「期待人情味」、「貶抑爭執」、「接納彈性處事」和「同意（為了團體）委曲求全」。每一種成分用五個敘述句來測量，向度總分越高，代表受訪者越接受傳統人情運作規則中的該種成分。
4. 人際自信（社會能力自我評估）：指人們對於處理各種人際互動情境的能力的自信或心理準備。這裡所謂人際互動包括建立、維持親密關係以及人際衝突，研究者從既有量表中蒐集其中可能令人為難、尷尬或可能引發衝突的情境，請受訪者對於自己能否適當處理做 1~7 點自我評定，分數越高代表受訪者越有人際能力的自信。

#### 五、結果摘要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及相對的發現或結論請參見摘要表如下。總的來說，價值觀和相關信念的世代差異似乎確實存在，但並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麼明顯和絕對，青少年對人際衝突的體會雖然和父母不太相同，但基本型態相似，他們評價人際衝突的潛在向度和父母也沒有明顯的差別。價值觀和傳統人情運作觀念雖然會影響人們在人際衝突互動中的判斷或決

策,但顯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來決定,而且其中分寸的拿捏恐怕是相當個別化的。就價值觀與其他相關信念間的相關以及對人際衝突判斷的預測來看,父母們的價值觀似乎具有比較顯著而穩定的意義,而且親子兩代在價值觀上的相關不顯著,我們猜想這是因為價值觀的形成和穩固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經驗的累積,而早期

價值觀的塑造可能比較依賴大環境的主流論述(相對於家庭的小環境),直到切身經驗實地搓揉,價值觀才終於經歷重整和確認,能比較穩定地影響人們的判斷或決策,而這樣的重整並不是簡單的單向度調整,而是有相關配套的整體調適。也許我們真的應該用生命經驗的差別而非時代的差異來解釋統計上所看到的世代差異。

## 研究結果摘要表

研究問題	發現或結論
1.有關人際間的忍讓寬容的價值觀及相關信念,目前的青少年和他們的父母之間,究竟有沒有差異?差異有多大?	就原始分數而言,父母們比青少年重視忍讓寬容的價值觀,也比較重視自我伸張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但如果用個人相對重視程度來看,兩代對忍讓寬容的價值觀的相對重視程度並沒有明顯差異,都在中間偏低的位置;但青少年對自我伸張的價值觀的相對重視程度比父母高,但差異也並不太大。兩代對於重視團體利益和人際和諧的傳統,都依然傾向於認同,但是年輕世代的確比年長世代比較不同意為了團體委曲求全,也比較不那麼同意退讓是一種人生智慧。整體趨勢看來,價值觀仍然在逐漸背離忍讓寬容,但已經相當和緩。
2.上述價值觀對於實際上人際衝突中的判斷或決策,有多大的決定力?	無論是忍讓寬容或是自我伸張價值觀,對於實際特定的人際衝突因應,都只有零星而微弱的關聯,即使達到顯著,預測力也都很低。
3.其他相關的信念是否有助於預測人們對於人際衝突因應的判斷?預測時有沒有特定的預測模式或規則?	加上其他的預測變數,在某些情況下預測力的確有增加,但並非一定有幫助。所能增加的預測力也相當有限(總預測力普遍低於10%),而且沒有一定的規則。價值觀的預測力在父母樣本中比較明顯,也許代表青少年的價值觀尚未臻穩定。
4.親子之間討論及分享對於人際衝突的看法,會不會促使親方或子方調整或改變他們的價值觀?有沒有增進親子了解或是人際自信的功能?	就參與者的主觀知覺而言,親子討論頗有「親密分享」和「促進相互了解」的功能。對於價值觀的調整或改變,本研究顯示活動前後的價值觀差異皆不顯著,兩代皆然。人際自信方面,部分青少年參與活動後,對於自己處理人際問題的自信反而稍低,顯示這樣的活動目前只能做到讓他們察覺做人的難處,卻並未能協助他們找到適當的因應或解決的方法。

## 參考書目

- 王叢桂 ( 1993 ) 。三個世代大學畢業工作者的價值觀。 本土心理學研究 , 2 , 206-250。
- 李敏龍 & 楊國樞 ( 1998 ) 。中國人的忍：概念分析與實徵研究。 本土心理學研究 , 10 , 3-68。
- 黃光國 ( 1995 ) 。儒家價值觀的現代轉化：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 本土心理學研究 , 3 , 276-338。
- 黃光國 ( 1988 ) 。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巨流。
- 黃俊傑 ( 1999 ) 。傳統中國的思維方式及其價值觀。 本土心理學研究 , 11 , 129-152。
- 黃麗莉 ( 1999 ) 。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台北。桂冠。
- 楊中芳 ( 1999 ) 。人際關係與人際情感的構念化。 本土心理學研究 , 12 , 105-179。
- 葉光輝 ( 1997 ) 。台灣民眾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 90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 (下)。 171-214。
- 葉啟政 ( 1995 ) 。結構以外：歷史的社會學「理路」初探。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 32 , 39-49。
- 羅國英 ( 1997 ) 。 青少年至成人前之親子關係的測量。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 NSC-86-2413-H031-004-GII
- 羅國英 ( 2000 ) 。母親教養期望與親職壓力及青少年親子關係知覺的關聯—兼談學業成就於其中的角色。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 第六期 , 35-72。
- Brindley , T. A. ( 1990 ) 。 Socio-psychological valu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 X IV, 41-42, 98-115.
- Hu , H. C. ( 胡先縉 ) ( 1949 ) 。 Emotions , real and assumed , in Chinese society . Institute for Intercultural Studies , Columbia University , New York , NO. RCC-CH-PR4.
- Hwang, K. K. ( 黃光國 ) ( 1997-8 ) 。 Guanxi and Mientze :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inese Society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 VII , 1, 1997-8.
- Monteith , M. J. , Zuwerink , J. R. , & Devine , P. G. ( 1996 ) 。 Prejudice and prejudice reduction : Classic challenges ,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 In P. G. Devine , D. L. Hamilton , & T. M. Ostrom ( Ed. ) , Social cognition : Impact on social psychology , 323-346.